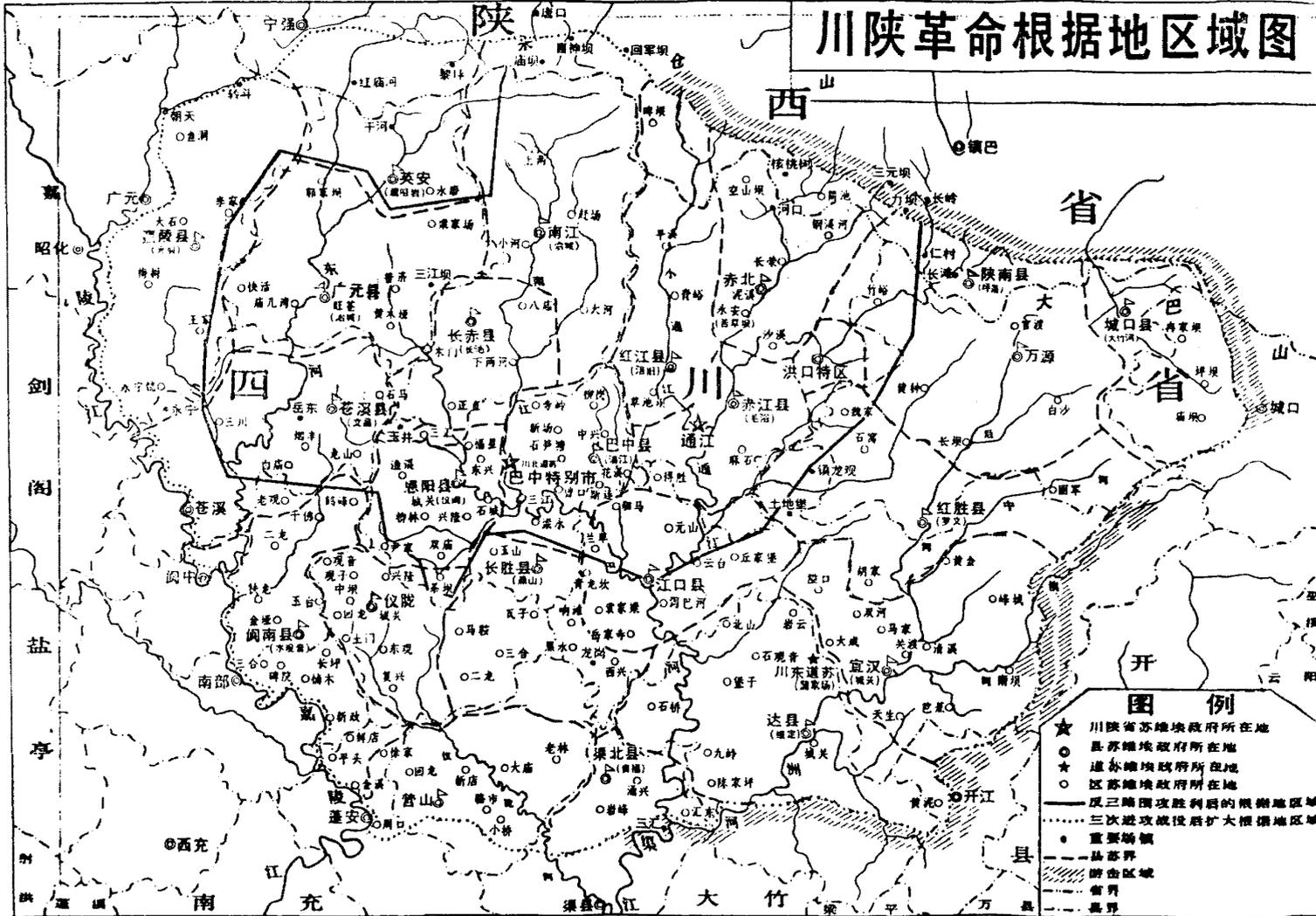


# 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 图例**
- ★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 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 ☆ 道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 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 反三顾国攻胜利后的根据地
  - 三次进攻战役后扩大根据地
  - 重要城镇
  - - - 县界
  - - - 游击区域
  - - - 省界
  - - - 县界

杜中编绘

## 编写说明

《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以下简称《粮政史长编》），是在四川省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组建专门班子，在已征集到大量粮政史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编写《粮政史长编》，目的在于通过川陕苏区粮政史实，再现当年苏区人民为支援革命、做好粮食工作而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缅怀革命先烈，鼓励从事粮食工作的人员，振奋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开拓前进；同时，也是为了使川陕苏区历史保留更多的文字记载。如果能为从事川陕苏区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史志工作人员，提供一些有用的历史资料，那更使我们感到高兴。

《粮政史长编》着重于收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全盛时期所辖的23个县苏维埃政区范围的粮政史料；关于陕南战役、广昭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中所新置的18个县苏维埃政区的粮政史料，写进“西进北上途中的筹粮活动”一文，载入“附录”之内。

在《粮政史长编》的编写中，为了保持历史原貌，我们尽量使用各级苏维埃政府原名，并适当夹注现属行政区划。因各地征集资料中的计量单位不同，且折率各异，编写中使

用的粮油数字，概依各地标准折为市斤，以便统一概念，并在文中一次加注说明。

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部份时间，是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粮政史料严重散失。我们在编撰过程中，虽然把资料搜集、整理、考证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组织力量查阅各种资料，走访有关人员，现在看来仍不能使人完全满意。特别是有的县资料奇缺，这就造成了某些“节”、“目”的资料覆盖面较窄的弊病，对主题显得有些佐证不力。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弥补这个不足。但总的看来，能为后人留下一点可资佐证的史料，聊胜于无，又有所欣慰了。

编写这部书稿，是从1986年6月开始的。当时四川省粮食局在平武县召开专门会议，向4个地市及23个县（市）粮食局布置资料收集工作。经过一年时间，先后查阅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教育学院资料室、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成都军区党史办公室、陕西省汉中地委党史办公室和宁强、勉县、南郑、西乡、镇巴等县党史办公室所收集的有关资料。访问了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中共原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红33军师长王波、川陕省工农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原妇女运输连李光英等老同志。还参阅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西南军阀史》、《中国粮政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苏维埃中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等资料书籍，以及徐向前、许世友、傅

钟、张国焘等撰写的回忆文章，和苏区各县的党史、志书等。并组织有关地、市、县200多名粮食职工，调查访问了当年的红军战士、苏区干部和曾经亲历其事的苏区群众950多人，记录了口碑资料383件，编写出《粮政资料汇集》23册，约75万字。

上述这些工作给编撰《粮政史长编》打下了基础。借此机会，我们对协助查阅资料的单位和提供情况的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不顾寒暑，爬山涉水，参与调查访问和收集资料的粮食职工，表示慰问。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中共巴中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公室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由四川省粮食局郝振洪同志主审，参加编撰的有：四川省粮食局粮食志编辑室李树棠、樊寅同志，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公室向思弟同志，巴中县粮食局罗家福同志，通江县粮食局吴兆民同志等，由李树棠同志主编。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失误或不当之处，敬请当年曾在川陕苏区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有关专家学者、史志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4月

# 目 录

编写说明	( 1 )
<b>第一章 背景综述</b>	( 1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1 )
第二节 防区制苛政与人民斗争	( 3 )
第三节 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 15 )
第四节 根据地的农业	( 26 )
<b>第二章 政策及机构</b>	( 36 )
第一节 粮食政策	( 36 )
第二节 粮政机构	( 41 )
附表一 川陕省县级以上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 任职名单	( 44 )
附表二 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杀害的乡以上粮 食委员名单	( 46 )
<b>第三章 筹粮</b>	( 48 )
第一节 接收	( 48 )
第二节 打粮	( 51 )
第三节 征发	( 61 )
第四节 公粮	( 63 )
第五节 收购	( 74 )
第六节 借粮	( 77 )

<b>第四章 供给</b> .....	( 81 )
第一节 部队供给.....	( 81 )
第二节 地方供给.....	( 88 )
<b>第五章 管理</b> .....	(100)
第一节 粮食管理.....	(100)
第二节 市场和粮价.....	(107)
第三节 惩治贪污.....	(114)
第四节 坚壁清野.....	(116)
<b>第六章 储粮</b> .....	(119)
第一节 粮库.....	(119)
第二节 保管.....	(130)
<b>第七章 加工</b> .....	(135)
第一节 粮食加工.....	(135)
第二节 油料加工.....	(145)
<b>第八章 运输</b> .....	(147)
第一节 人力.....	(147)
第二节 航运.....	(160)
第三节 畜力.....	(163)
<b>附录一 西进北上途中的筹粮活动</b> .....	(166)
<b>附录二 人物简介</b> .....	(177)
刘彦清(红江县粮食局副局长).....	(177)
石万文(宣汉县天生区苏粮食委员).....	(178)
马国栋(赤江县广纳区苏粮食委员).....	(179)
苏成美(万源县妇女运粮队长).....	(181)
李家如(川东游击军的筹粮人员).....	(182)

## 第一章 背景综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人民共同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万，先后共建有23个县和1个特别市、2个特别区的苏维埃政权。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它“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它“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sup>①</sup>

还在红军到来之前，川陕边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已为爆发这场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川陕边区，地处秦岭、米仓山、大巴山的南北山麓。大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第36—37页，江西社会科学院1981年9月（内部发行）。

巴山脉横贯于川陕鄂三省边境，东西绵延500多公里。山脉最宽处80公里，北缓南陡，其主峰“高耸千寻，岩径极险，春夏积雪不消”，是矗立于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嘉陵江和汉水的分水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川陕边区，虽地处秦蜀往来的要冲，但交通十分不便。巴山主峰一带，“陆行则叠巘凌云，登舟则湍流迅隐”，凡征旅至此，只得结伴裹粮，岩宿涧饮，在乱山密箐，鸟道羊肠、悬崖栈道中艰难行进。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就是对这一带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川陕边区的近20个县中，除川北的通江、南江、万源和陕南的镇巴、南郑、宁强、西乡等县，因紧靠大巴山主脉，境内大山绵亘、峰峦起伏，多幽崖荒谷外，其余地区多为深丘、浅丘和小平原纵横交错的地形地带，一般在海拔400至800公尺之间。那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巴河、洲河和汉水纵贯其间，水利资源丰富，有灌溉、运输之利，适宜农作物生长。主产水稻、小麦及红苕、洋芋、包谷、棉花、油菜。农村亦多栽桑养蚕，可算是鱼米蚕绸之乡。

紧靠大山老林的地区，海拔一般在800至2000公尺之间，山高坡陡，道路崎岖，真是“望天一条线，看地一条沟，老鹰飞不过，猿攀也发愁”；且气候变化无常，春夏少雨，常遭旱魔肆虐，秋又霖雨成灾，冬季积雪盈尺，冰凌如柱，数月不化，并常受风、雹灾害袭击。由于山高土凉，作物生长缓慢。主产包谷、洋芋、红苕和荞、麦之类。

山区人民具有勤劳勇敢的美德，在那山险水恶、荆棘丛生的生产条件下，为了多打粮食，养家糊口，一年四季不得不辛

勤劳动。他们开荒种地，垒石造田，拦溪蓄水，凿渠修堰。缺牛耕田用人拉，男劳不足就由妇女耕耘。高山区的农业多数还停留在“一把弯刀一把火，一把种子一碗粮”的刀耕火种阶段。收获季节，还搭起窝棚，烧起篝火，日夜防守野兽危害。川北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高高山上没搞头，又出野猪又出猴，要得夫妻同床睡，除非包谷收上楼。”道出了山区耕耘者的艰苦。

在生产中，由于粮食品种杂乱，加之耕作粗糙，所以产量很低。高山区一般亩产100多斤，中低山区一般亩产200多斤。农民所获谷、麦，主要用于抵交赋税和捐款。一遇灾荒年景，绝大多数农民则处于“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境地。

川陕边区虽然有富饶的资源，但由于军阀和豪绅地主的盘剥，这些资源并未得到开发利用。在他们的统治下，连年混战，捐税繁重，人民购买力十分低下，工商业极不发达，文教卫生事业极其落后；加之军阀为收取重税又强迫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其结果不仅粮食减产，还造成烟毒流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所以，整个边区呈现出一派百业荒废，万户萧疏的景象。

## 第二节 防区制苛政与人民斗争

### 一、苛政下的人民生活

自民国初期到红军入川前的20多年中，四川大小军阀相继崛起，他们按各军势力，实行防区割据。为了争肥割地，独霸一方，在1912年到1934年的22年中，大小军阀混战479次，平均每月就有两次战祸。1932年冬所爆发的刘湘与刘文

辉争霸四川的“二刘”大战，“双方伤亡至少当在五万人以上，军费消耗不知若干万万，人民直接或间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不能数计。”①据1932年12月29日上海《申报》披露：“五年来，川陕人民共计负担军费达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元，人民膏血为军阀吸吮干净。”由此可见，四川军阀混战次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以及为祸之烈，全国罕有。

各派军阀为维持巨大的军费开支，都恣意摊派捐税，并勾结官僚、豪绅，横征暴敛、荼毒人民，加之盗匪猖獗，灾祸连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田赋和捐税是军阀收入的主要来源。四川军阀“一方面要扩充军队购买军备，一方面要堆积财富任其挥霍，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②在田颂尧统治的川北地区，粮税奇重，税额陡增，苛捐杂税，举世罕见。“广元粮税年只七千余元，近年来已征七十余万元，等于一年完粮百年。”③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元，完全按粮摊征，“每两征银竟有达一百八十二元者，”④超过民国初年每两粮征银一元六角上百倍以上。各军阀防区，“开始实行预征，但每年不过预征一年或两年，以后则肆意征取，有一年而征数年之粮，有一月而收一年之税。自民国九年至二十三年（1920年至1934年）底止，为时仅15年，

---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03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③ 黄渠：《川军剿匪之经过》，载《复兴月刊》第3卷6、7期合刊，第167页，1934年10月。

④ 冯法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834页，黎明书店，1935年版。

而各县则有征至民国八十年以上者。”①川北地区“20军杨森预征到1989年”；“29军田頌尧预征到1987年”，“军阀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竟预征达到一百年以上，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②苍溪县1924年摊派军饷8.4万元，后又倍增到16.8万元，至1932年增加到32万元，加上赋税每年不下40万元，田赋已征到1996年，民谚有“民国未至三十载，田赋征到一百年”之语③。当时的《成都快报》报道：“四川农村赋税负担征取之繁，数额之巨，任举其一，均足以称今世苛杂典型之邦。”④

至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勒索之重，骇人听闻。据统计，在全国673种苛捐杂税中⑤“四川当时就达70多种，”⑥“陕西的项目也多达40种，”⑦困民苛政，莫基于此。

在诸种捐税之中，尤以鸦片捐税极重。鸦片捐又称特别捐或特别税。军阀强迫农民大种鸦片，其目的是征收重税，以扩大财源，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1932年南江县的捐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仅烟捐一种，一户中农就要缴60

①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30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年9月版。

② 黎民：《军阀刘湘的财政搜括》，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第4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苍溪县粮政资料》第6页，苍溪县粮食局1986年编。

④ 《四川农村赋税负担概况》，华同社稿，载1935年5月27日《成都快报》（第3174号）。

⑤ 闻亦博：《中国粮政史》第141页，正中书局1942年8月版。

⑥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6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社，1980年版。

⑦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20页。战史编辑委员会，1963年7月编。

元。①”1918年军阀郑启和驻通、南、巴时，强迫农民大种鸦片，在秋收时每户派特别捐10元半，通江县一次派捐80万元，通、南、巴人民为此曾爆发了一场反10元半的抗捐斗争。自田颂尧建立防区后，烟捐数额陡增，“当时巴中每年要缴特别捐一百万两，通江七十万两，南江三十万两。”②按当时每两银折2.65元计，通江的烟捐为185.5万元，高出郑启和统治时的五倍多，仅此一项，平均每户要捐款60元。“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烟，他们好收高税，群众也希望鸦片烟种好一点，才交得起税。否则，连税都交不起。”③于是造成了大面积的种植鸦片烟，通南巴地区的种植面积曾达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造成良田千顷，满目罌花，粮食锐减，烟毒流行。

刘存厚的防区，虽未重收特别捐，但苛捐杂税数目仍是急剧增加。万源县民国初年田赋征银4万元，至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饷款重叠，逐年增加，到1932年秋，猛增到24万元，外附加一成经费2.4万元。还有团练费，各区团办事经费，以及一切所谓振兴事业，无不取之于民间，全年合计50余万元。加上团练之浮滥，差委之苛虐，不下20万元。连此国课、正供、地方附加和各种税捐计算，全县负担在百万元

---

①②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6、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陈明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若干问题》，载《四川革命现代史研究资料》1980年4、5合期，第30页。

以上①。

为了催逼捐税，防区的“催科胥吏，踵接民间，公私局卡，遍于津路”；地方团、保也乘机磕索百姓，交不齐捐款的农民，不仅遭到催款人员的关押、吊打，而且还逼迫交纳关押费、吊打费和取保费。地方若不能缴足捐税，军队就派兵下乡追缴，不仅闹得农民鸡犬不宁，而且一笔庞大的招待费又压到了农民头上。通江县罗家河坝（今铁溪区檬坝乡），当时设两保六甲，户不过四百，人不到两千，山大人稀，土地瘦薄。农民因长期遭受剥削，累欠捐款租税，积债难负。仅捐款一项多达30多种，户平积欠150余元。由于逼捐甚紧，逼得杨述太等数十户农民住庙宇、居窝棚，投宿岩洞，近百户农民逃难异乡。“陕西城固县1931年中，县府竟派二百余委员下乡，每一委员又带随员三、五人不等，他们宛如一群蝗虫，一切供应都出自乡民。”“供应所费远过于税捐之原额。县府委员之外，还有善后清查处所派出的清查委员。清查委员也和县府委员一样地人数众多，一样地如狼似虎，遇着欠款农民，动辄鞭打绳捆，严刑吊拷。”②据当时《四川月报》记载：“川北数村，农民将田契贴在户上，称无力缴税，愿当局没收其田地。”③陕南农民，因交不起繁重的赋税，“他们最初出售土地，再则卖什物，继则又典卖房屋，……。随后田地无人过问，举地赠人且无人敢要，房屋什物

① 1932年《万源县志》，转摘自《万源县粮政资料》第40、41页，万源县粮食局，1987年编。

② 冯法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811—819页，黎明书店1935年版。

③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4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又无人肯买，贫农只得弃地不耕，卖儿女以作逃亡的费用。逃户应摊到的税捐还是分配与未逃的农民，昔日三人负担的现变为两人负担。因此，更加催促了未逃亡人家早日出走。”<sup>①</sup>

军阀的横征暴敛，榨取得农民一无所有，大多数人荒月时节以草根树皮为食，倾家荡产，已居十之八九。“兵如梳，匪如篦，团丁犹如刀刀剃。卖猪牛，卖田地，倾家荡产还债利。捐捐捐，利利利，如今只剩一口气。”川北地区当时流传的这首民谣，就是人们生活的真实纪录。

川陕边区人民不仅要负担繁重的苛捐杂税，而且还承受着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作为农民生存基础的土地，大多掌握在地主手里，农民仅有很少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一般说来，占总人口5%至10%的地主，却占有总耕地面积的70%至80%，为了维持生计，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农民只得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承受着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

地租一般是三七开、四六开或对半开。即地主坐享五至七成，耕者只得三至五成。所订地租，农民称为“铁板租”，即不管丰歉如何，收成好坏，秋天都要一律交清。若遇灾年，粮食歉收，地主逼租，农民或当田当地，卖房卖物，或以做苦力抵交租子，若有欠租，则受“加租”、“加押”之罚，或加20%至50%不等，视欠租时间长短而定；对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地主当即就要“起佃”，使其无地可耕，沦为“长年”。

---

① 冯法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811—817页，黎明书店1935年版。

军阀逼捐，地主逼租，逼得农民只得向地主借贷，一是借钱，二是借粮。粮的利息一般是3至5分，即借谷1斗秋时加还3至5升，而放债者粮贱收钱粮贵收谷，认涨不认跌。借钱有场息、月息、年息三种。场息是高利贷中最高的一种，有“搭搭钱”，即头场（一场三天）借，二场加还5%至20%的利；更有甚者是“筋斗利”，头场借10元，二场就还20元，如继续欠款则翻番，以此类推。月息利率为1分，俗称“月百钱”。还有一种方式叫“先追利”，即借钱10元，先扣息2元①。

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泥坑，就不能自拔，有的倾家荡产沦为乞丐。旺苍县农民杜先春，借了地主1斗毛高粱，半年后还了1斗8升小麦，还帮地主做了1月苦工，才算还清债务。该县小河坎林孙氏，因在地主家借丝作抵押，一时不能偿还，后来仅在地主家吃了1顿饭，得了1升粮，就把自有的10几背田地抵得精光。逼得林孙氏哭瞎双眼，终因讨不到饭而饿死②。通江县城郊农民陈昌德，家有30多背田地，3间房子，因无钱缴款，向放贷者以“筋斗利”形式借钱5元，一场应还10元，连续20天，就把几十背田产和三间房子全部滚走，全家人沦为乞丐③。

---

①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升保起义调查报告》，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43—44页，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1963年7月（内部资料）。

③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简史》（初稿）第10页，1960年3月铅印本，原件存巴中县档案局。

农民除经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外，还遭受土匪的骚乱和抢劫。大巴山的土匪，早一点的有孙杰、马万山、钱天锡，至后有曲江洞土匪罗玉成、王三春，高洞子土匪袁刚，广家店土匪李茂春，钱家山神匪袁玉章，老君山土匪景辉秀。众匪首之中，以横行川陕边区的王三春势力最大。这些土匪在红军入川前，或以险要的岩洞为巢穴，或以峻峭的荒岭为屏障，或以巍峨的古寨为依托，他们配备有大量的枪支弹药，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成整，昼伏夜行，横行乡里，烧杀奸淫，估抢强夺，手段残忍至极。多少人被土匪残害得家破人亡，也有不少人被土匪胁迫上山而当了随从。

一遇灾荒年景，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大旱，川省被灾者七十四县，而以通、南、巴为最，三县中以通江为最。县属又以南路为最，……迨至十四年，城中升米价值五千。富者或购粟远方，而贫者，始则采食豆苗，继则草根树皮，掘剥无余，抛儿弃女，相望于道。……五六月，瘟疫流行，沿门传染，死亡相枕籍。”全县“因饥极跳河、服毒、投崖、自焚及流亡者十余万众。”<sup>①</sup>据1925年2月16日《国民公报》载：巴中饥民“树皮草根业已吃尽，无以为生，饿死者十分之三。现在数遍十家，即有八家无食，数遍百人，即有十人无穿，……最惨者，厥维东南路之小宁山、浮鸭河、杨家湾一带，饿死人民沟死沟埋，路死路埋，不计其数。城内去年腊月起，死人太多，特在龙王庙官山内掘一万人坑，以便掩埋。至今第一、第二大坑已填满，第三大坑又在继续抬埋。”在川北等地“盗食死尸之

<sup>①</sup> 《通江县志》（民国续修稿）灾异志第55页。

事，时有听闻，”“杀人卖肉，殆已成风”。在万源更出现了“大规模之吃人剧场，纵横二三十丈内，人头星罗，尸骨狼籍，……被发之墓，数十百堆。”<sup>①</sup>当时川北地区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甲子乙丑起，米卖七百几。碾子起青苔，磨子推断齿。富人倒有粮，穷人借不起。杵棍讨四方，遍地人饿死。”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惨的现实。

## 二、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边区就有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开展革命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1922年吴玉章在达县宣讲马克思的社会学；1923年王维舟在宣汉清溪场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以及共产党员陈锦章从上海回到宁强一带的活动，李鸣珂回到南充一带的活动，苟寿南等在巴中一带的活动。经过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使边区人民逐渐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也逐渐认识到要想翻身作主人，只有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共川东特委在宣汉农村，“秘密组织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抓丁派款，斗争恶霸地主，从农会中选拔又勇敢又有觉悟的青年，组织了小股游击队。白天生产，晚上集结，星星点点的火种，很快蔓延到开江、梁平和大竹县一带。”<sup>②</sup>1927年秋，因田颂尧驻巴中的谢庶常旅借口联团扩军，派特别捐100万两，加之县征收局在征收中趁机加重农民田赋，由苟寿南建立的“农民

① 黄淑君：《军阀割据混战与四川农民》，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第42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② 王维舟：《川东游击军的斗争》，载《星火燎原》第1卷，第486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3月第3次印刷。

